

宋人流行藏书动辄上万卷

大文豪苏轼为何不藏书？

苏轼像



北宋仁宗庆历年间，毕昇发明了以活字排版印刷法，图书也就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，各种版本的古籍以及时人的著作，都大量印刷出版，许多文人亲自校对书籍，以正谬误，然后分类收藏，由此诞生了许多的藏书名家。方兴日盛的藏书之风，对宋人的学识修养的提高，以及学术研究的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苏轼幼时，恰遇这一图书的革命性时期，也为他日后“学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”带来诸多的便利。他曾自述：“余犹及见老儒先生，自言其少时，欲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而不可得；幸而得之，皆手自书，日夜诵读，惟恐不及。”

在苏轼之前，老一辈的读书人想要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这样的史籍都很不容易，煞费周章地借了回来，要赶紧抄录，然后日以继夜地诵读，生怕时间到了要把书还回去。但是，一生读书、到老不倦的苏轼，却没有像当时的许多文人名士那样，拥有汗牛充栋的藏书，可以坐读释道，卧读经史，甚至连一些常见的典籍他也没有。

苏轼曾在《海上与友人书》曰：“到此抄得《汉书》一部，若再抄得《唐书》，便是贫儿暴富。”自谓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以后，无书可读，只是在当地的士人家里抄录得了一本《汉书》，并想象要是再能抄到一本《唐书》，那种感觉就像是穷人于一夜之间暴富。其实，据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载，苏轼渡海至儋州的行李当中，就有好几箱的笔和墨。至于他宁可携带大量笔墨，而不是携书到孤岛上，可供随心所欲地阅读，一方面足见他的自信和旺盛的创作需求，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并不竞尚风气，追随潮流而藏书。

在当时，许多文人名士都以藏书为时尚为乐事，私人藏书动辄上万卷。如晏殊之子晏几道，就以藏书多而闻名，以至于家道中落以后，每次搬家，

他的妻子都要为搬书而烦恼。另外，江陵有个叫做田伟的小吏，在家里建有博古堂，藏书多达五万七千余卷。黄庭坚到他家里作客，看到他的藏书都惊呆了，叹曰：“吾尝校中秘书，及遍游江南，名士图书之富，未有及田氏者。”黄庭坚的舅舅李常，为唐代皇室的后裔，他年轻时藏书读书的僧房，后被命名为“李氏山房”，藏书也多达九千多部。

处于这种大环境下的苏轼，也并非没有藏书之心。苏轼的《仇池笔记》载，唐太宗曾经花费重金购买晋人书帖，共收罗了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在内的书帖千卷。武则天时，宠臣张易之兄弟从内府把这些书帖偷了出来，随后又散落在宰相王涯、张延赏的手里。

“甘露之变”后，王涯为禁军所杀，他家里的金银珠宝都被洗劫一空，因禁军不识这些书帖的价值，故得以幸免。后来，苏轼在宋仁宗的驸马李玮都尉的家里，看到了这批谢尚、谢鲲、王衍等晋人的书帖，心里也非常喜欢。但是，一想到这些书帖的传承过程，简直就是招灾揽祸的根源，而且除了作为书架房舍里的装饰，用以炫耀人前，也并没有其他的用处。因而，苏轼对这种貌为集古、实为矜奇立异的行为，也失去了兴趣。

后来，苏轼应朋友李常之请，为李常将“李氏山房”的藏书全部捐赠出来、用作公益一事作记，又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：“自秦汉以来，作者益众，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，而书益多，士莫不有。然学者益以苟简，何哉？”意为自秦汉以后，著书立说的人愈来愈多，写字用的纸笔和字体也愈来愈简便简化，不论何地都可找到书读。可读书人却愈来愈草率马虎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
接着苏轼又问：“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，日传万纸，学者之于书，多且易致，如此其文词学术，当倍蓰于昔人，而后生科举之士，皆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，此又何也？”意指如今的印刷业发达繁盛，书籍得以大量流通，要找书读方便多了，按理说读书人的学问也应当比前人高出一倍才是。可是那些科举之士，却把书卷起来不读，反而闲谈不暇，言语浮夸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

借此两问，苏轼道出了时人藏书的几大弊病。一是浮慕时名，藏书只是为了获得名声，而非为了钻研学问。二是家中费尽心力收罗得来的藏书，从不阅读，全都束之高阁，只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。三是把藏书视为私产，不仅自己不读，书亦不外借他人，只是为了收藏而收藏。所以，苏轼极力夸赞李常捐赠藏书、以遗来者的义举，鼓励有志读书的人，要奋力进取，有所作为。

苏轼不追随潮流而藏书，也是他有定见、不盲从，尽量多做实事的人生态度的体现。

据《湛江晚报》

驿传：古代的旅馆

我国最早的旅馆称为“驿传”。西周早期，驿传已相当普及，统治者在通往都城的道路上广修客舍，便于各地诸侯入朝纳贡和朝觐时休息。不过早期驿传带有鲜明的等级色彩，文人士大夫可以随时入住，平民百姓恐怕只能敬而远之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除了官用“驿传”，名为“传舍”或“逆旅”的商业性客舍也出现了，遍布各地。秦国大一统后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“驿传”制度，汉承秦制，“驿传”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。据史书记载，西汉初期，各地均在交通要道上设立驿馆，每三十里一处。当时西汉都城长

安（今陕西西安）的客舍也星罗棋布，不仅有可供各郡来客住宿的“郡邸”，还有专门接待外宾的“蛮夷邸”。

唐中期时，“馆”和“店”分化成两种不同的类型，要区别它们并不繁琐——“馆”通常指较大的旅馆，有“公馆”和“私馆”之分；“店”多由民间自办。“馆”和“店”的食宿设施不尽相同。《太平广记》记载：汴州（今河南开封）有一家“板桥三娘子店”，店内设有单人间、双人间和多人间，三娘子做烧饼充当客人的早饭，并出租驴畜。

据《天津日报》

舌尖上的古代冬韵

如今，科技的发展已经能让我们在冬日吃上四季的蔬菜。而在古时，反季节蔬菜同样也端上了古人的餐桌。不过，当时用温室培育的反季节蔬菜价格都颇高，多为满足权贵的口欲，一般百姓难以消费。清朝诗人李静山就曾写诗感叹过反季节蔬菜的昂贵，“黄瓜初见比人参，小小如簪值数金。”

最早关于反季节蔬菜的记载始于汉代，《汉书·召信臣传》有载：“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，覆以屋庑，昼夜燃蕴火，待温气乃生。”可见，当时皇宫内的太官园就早已掌握了利用“温室”培育反季节蔬菜的方法。此外，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同样也提到了汉代反季节蔬菜的种植方法，“土室蓄火，使土室蒸鬱而养之，强使成熟也。”

北魏时，生产反季节蔬菜的“温室”从地上搬到了地下，开始利用地窖燃火升温的方法进行反季节蔬菜的种植；而到了唐代，人们甚至开始利用温泉水来创造适合反季节蔬菜种植的温度。唐诗人王建就曾写诗记载，“内园分得温汤水，二月中旬已进瓜。”

宋朝人除了栽种反季节蔬菜，还用温室来培育反季节鲜花。宋朝《齐东野语·马塍艺花》中有载，“以纸饰密室，凿地作坎……然后置沸汤于坎中，少候，汤气熏蒸，则扇之以微风，盎然盛春融淑之气。经宿，则花放矣。”

到了元朝，农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保温方法。他们会在冬日用高粱秆做成“风帐”将菜地圈起来，形成一个密封的空间。然后，在菜地上铺满马粪、草木灰进行保温，再在上面种植黄瓜、扁豆、菠菜、芹菜等鲜蔬。此外，元代农学家王桢还曾在其所著的《农书》中记载了用温室种植韭黄的新技术：“至冬移根藏于屋荫中，培以马粪，暖而即生，高可尺许，不见风日，其叶嫩黄，谓之韭黄……”

明清时，北方的农民又创立了一种名为地窖式温室的技术。这种温室既可以充分利用太阳的光热，又可以烧火加热温室直立土墙，帮助提升温度，一时间使得反季节蔬菜的产量大涨，也让其价格大幅下降。《五杂俎》中就记载当时不仅达官贵人吃得起反季节蔬菜，连普通老百姓也能在冬天偶尔尝个鲜。

说完古代反季节蔬菜的历史，古代反季节蔬菜种什么也颇值得一提。《盐铁论》中记载汉朝时种植的反季节蔬菜就多达二十种，像韭菜、冬葵、紫苏、生姜、木耳、葱等，在当时就已端上了冬天的餐桌，而唐朝时又多了瓜茄。到了元朝，黄瓜、扁豆、菠菜、芹菜这些新鲜蔬菜也开始陆续加入到反季节蔬菜的行列中。

（据《邯郸日报》曾龙）